



国家的中国开始： 一场革命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国家的中国开始： 一场革命

李鸿谷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家的中国开始：一场革命 / 李鸿谷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6

ISBN 978-7-108-04000-8

I. ①国… II. ①李… III. ①辛亥革命—研究 IV.

① K25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3870 号

责任编辑 张 荷

装帧设计 康 健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7.25

字 数 213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29.00 元

目 录

绪论：与历史和解.....	1
慈禧 爱新觉罗家族的国家危机.....	20
康有为 王朝权力的结构崩裂.....	47
戊戌变法与晚清政治生态.....	57
孙中山 现代中国的革命路径.....	92
袁世凯 辛亥年间的中国政治格局.....	122
宋教仁 民主政治的开始与失败.....	150
辛亥十年后 革命的民国逻辑.....	180
那些人，这些书.....	208
后记.....	261

绪论：与历史和解

经常，新闻从业者会这样来定义自己的职业：新闻是历史的第一份草稿。做一个“写历史”的人，即使是草稿，也是新闻人成就感的来源。

如果，有一个机会，让新闻人去真的写一次历史，比如辛亥革命，挑战何在？或许，新闻的方法论能否对历史的发现与叙述有所贡献，才是这个职业自我价值最好的证明。

当我可以去为杂志连续写五个辛亥革命封面故事时，这当然是一个机会。

现 场

新闻，更准确地说新闻事件，源自现场。辛亥革命的现场何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四个月后，1912年2月12日，宣统逊位，辛亥革命以推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而告结束。百年之后，再来看那段历史，四个月零两天的革命，当然是一场事件，只不过后世读史者得将其命名为“历史事件”。

武昌首义，确系仓促，擦枪走火，起义爆发。孙中山评论：“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澂（湖广总督）一逃……初不意一击而中也。”武昌首义系出偶然，甚至辛亥革命也由于偶然，在相当长时间里，即或当下，是“假设史学”立论的始点。

只是“偶然”论无可解释，武昌首义之后，很迅速，南中国竟有十二个省份独立或光复，再加上陕西与山西的独立，十四省离析。一起偶发事件，半个中国决裂清廷。即以偶然为始，而有如此结果，也当深思为何格局如此巨变。

在更长的时间里，这一历史事件我们沿着清廷反应、袁世凯崛起以及孙中山返国……来观察并叙述事件的走向。这符合传播要素，但却忽视了历史现场里关键却未必有足够传播性的事实。武昌首义，如何定义其成功？总督瑞澂的逃亡，意味着抵抗者放弃了抵抗，是起义未有激烈战斗的原因，它只是成功的条件而非成功本身。军事起义，若言成功，则必须由军事而行政，或者两者合一，成立独立于清廷有自己政治主张的政府，才是成功。那么，武昌首义之后，湖北以何种方式建立“独立政府”？

总督瑞澂以及朝廷命官之外，此际各省均已成立谘议局，作为未来清廷“立宪”组织上的准备。按理，瑞澂等逃亡之后，谘议局才是保存并延续清廷政制的关键力量所在。回到武昌的历史现场，起义后的第二天，以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为首的湖北立宪派，即与起义军进行了联络。汤氏表示：“革命事业，鄙人素表赞成。”——这才是历史走向关键性的因素所在。晚清末年，刚刚兴起，正待成长，代表传统文人集团的“立宪派”，不为捍卫清廷，而竟自反正，湖北独立有了组织保障。所以，从政治的角度观察，武昌革命，新军先发，谘议局附议，这种合作，才是首义能够成功，尤其是社会能够稳定的重点。

随后十四个省份独立或光复，其遵循的路线，莫不如此。由传统中国士绅构成的“立宪派”这一政治力量，与起义军若不取合作而择对抗，清末之格局如何，还真未可知。

在历史现场里，忽视“立宪派”合作的这一事实，历史逻辑殊难拼接。也正是因为“立宪派”的合作，十四省独立。那么新问题

则是：半个已经独立的中国，由谁？以及由何种方式来组织“中央政府”？黎元洪与黄兴的大元帅之争，就是这种临时政府组织之争的序幕。机缘巧合，孙中山此际听闻革命，从美国去欧洲，然后由香港转至上海，在必须而且迫切成立的临时中央政府这一组织上，他当然是不二人选。

孙中山自 1895 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倡导并实施革命，历十六年，终由武昌起义而导致清廷崩盘。虽则武昌首义并非孙中山以及同盟会直接领导，但它却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一个结果。也因如此，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这断非偶然。

独立的省份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临时政府的建立，清朝未来之存亡走向，可以由革命派与立宪派合作而成的临时中央政府，与清廷或者战争或者谈判来决定。清廷的代理人袁世凯尤其是其所领导的军人集团，将做何种选择，遂成关键。

如果将曾经的历史现场比如成一场“球赛”，那么，新军起义、谘议局附议、各省独立，然后以孙中山为首脑成立临时中央，视为辛亥革命的上半场。以 1912 年元旦为转折，下半场开始，谁将主导？“非袁莫属”，在当时几乎舆论一律。后来，袁世凯称帝，北洋军阀混战，反差之巨，那个短暂的四个月的历史现场里，袁世凯面目由此难以索解。可是，如果我们不寻找并确定历史现场的真事实，历史将真无可避免地成为被任意打扮的小女孩。

这场“球赛”的下半场，延续十多年之争的“君主立宪”与“共和”，必须作一了断。

袁世凯的本意当是“君主立宪”政制。军机处前同事世续指着自己脑后的辫子问他：“大哥，你对这个打算怎么办？”袁肃然而答：“放心，我还是很爱惜它，总要设法保全它！”清廷尤其是摄政王载沣起初并不想授权袁世凯，但若无授权，清之亡，顷刻之间，而用袁

“甚或保证不亡”。于是，袁世凯先领湖广总督，继而钦差大臣，最终获授内阁总理，清廷为数不少的权力尽相授受。在清廷一方，命运全交予袁一人。清廷之所以如此选择，另有潜因则是各国驻京公使团一致推举袁世凯，并且要求：不是任他（袁世凯）为一个寻常的高级官吏，而是作为朝廷的顾问兼皇权执行者。

然而，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央政府的成立，“君主立宪”与“共和”，制度变更，在南北对峙的情况下，最自然的走向是：以战而定政制。

历史在此罕见地显现了它理智的一面。开始是同盟会重要成员汪精卫宣称未来临时大总统“非袁莫属”，稍后黎元洪亦如此表态，最后孙中山也说：一旦清帝逊位，则将临时大总统之位让予袁世凯。这般格局，意味着“球赛”下半场的重点，“临门一脚”，关键“球员”是袁世凯，如果他能说服清帝逊位，革命，将以最小的成本而告成功。袁世凯所获酬报则是：临时大总统。

当然，无论袁世凯所领清军，还是革命党的起义军，为制度更迭而战，最现实的挑战是彼此均无足够可用之军费。这层现实之下，避免战争避免生命损失的基本理性占据了主体，以谈判而非战争而定制度，成为中国现代化路向里最为经典而有价值的一次转折。无论我们以什么样的动机来揣度袁世凯，也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结果都是他选择了“共和”之道，并迫使清帝逊位。

由此以观，那个狭义的、四个月零两天的辛亥革命现场，最终袁世凯跟革命派和立宪派合作，合力促成清帝逊位，结束君主专制制度。

历史现场有着各种驳杂的信息，后世研究者与读史人的基本功，则是返回历史现场，寻找、发现并再现其复杂甚或矛盾的各种事实。所谓史实重建，其理路亦在此。但是，重建历史现场的努力，其目标仅仅是还原现场，则远远不够。由现场入手，读史而知史，功用在于

能否从现场里寻觅关键证据——促成辛亥革命成功的核心要素，由核心要素而深入，则能建立历史逻辑的框架，并据此提供历史解释。所谓的深度新闻报道，其方法即如此，历史研究又何能例外？

舞 台

辛亥革命现场，我们可以发现三重力量的合作。其一，孙中山及其革命党；其二，士绅集团的立宪派；其三，袁世凯与军人集团。他们当然是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的核心要素。至此，我们有机会提出这样的假说：这三种倾覆清廷的政治力量，是促成传统中国进入现代国家的历史动力系统。是否如此？需要求证。

以新闻从业者的角度思考，所谓现场，实则内里为一种“冲突”——清廷能否存续？共和可否确立？是辛亥革命现场里的“冲突”所在。发现现场，认识冲突，无论是新闻现场，还是历史现场，必然会本能地简化成一种好奇：为什么是这三种力量合力促成了清廷之亡？好奇心，或言疑问，无论是读史叙史，还是记录新闻，皆为动力所在。

且慢求证。按新闻的方法论，理解并解释任何事件或事实，需要在三个维度里予以考察：冲突、人物与舞台。辛亥革命当然是一场剧烈的“冲突”，足以使一个王朝崩溃；那么，这个冲突是在什么样的舞台上进行的呢？同样是进入现代国家，日本达至明治维新，亦有军事冲突，结果却与中国迥然相异，不同的舞台（国家），结果当然不同。我们需要知晓辛亥革命是什么样的“舞台”背景。极言之，“冲突”以及革命现场，在相当程度上只是我们去发现并认识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现代化肇始的入口而已。

微观来看当年的湖北，辛亥的前一年，长江下游暴雨，蔓延至中游武汉，米价上涨；而同时，湖北由于灾年，政府收入减少，削减军

人兵饷，便成一时流言。这还真不是流言，官兵削减 40% 兵饷，在两任总督轮换之际，政令已下。这局部的现实，或许是促成武昌首义的外部因素，但这解释不了整个南中国地区的独立。

一般史论解释辛亥何以爆发革命，直接的促因一是保路运动，一是皇族内阁。清廷举外债以度日，是此时的常态，能够拿出来作为抵押物的，铁路成为核心资源。原本已经民间经营的粤汉与川汉铁路，在皇族内阁成立后的第二天，即决定收回国有，用以抵押。但是，清廷将民间已有大量投入的两条铁路收回国有，对过去的民间投入资本，没有任何补偿，虽则后来对广东有补偿、湖南有部分补偿，但对四川与湖北竟然完全置之不理。民间资产被清廷如此蛮横剥夺，民变已经激发。四川首先兴起保路运动。湖北新军一半由汉人入川进行镇压，内部已经空虚，起义条件成熟。而建立内阁，原为立宪之必要步骤，但内阁名单既出，舆论大哗，以皇族为主的这一内阁，岂止保守，完全倒退。客观而言，保路运动以及皇族内阁的激荡，真实影响的是士绅，经济上政治上双重打击，风潮已无可避免。

晚清舞台，经由两项极端举措，蜕变已在弦上。但是，如果我们观察仅止于此，仍然只是理解辛亥革命之因素，而未窥晚清政治舞台之格局。

将辛亥革命论为中国进入现代国家肇始的标志性事件，当然准确，但若理解何以巨变，则必须拉开足够距离。历史事件中的各色人等种种行为，其来有自，关键的是对晚清七十年走向的基本认识。所谓舞台，其变化没有那些戏剧性事件醒目，但却是种种事件积累而成。不真正深入历史，无可把握其间脉络，更遑论认清舞台格局。

清一朝，历康熙、雍正与乾隆三朝，即至高峰。君主专制，空前集权，亦在此期由雍正创造出来。军机处，帝国最为核心机构，属臣权力之顶峰，仅为皇帝秘书而已。清朝遗产有两宗，为中国留下自

成吉思汗之后，最广阔的疆域；同时为中国留下4亿人民。这是今日中国国力的基石。但是，任何历史运动皆有成本。这其中，人口与土地之关系，又为传统王朝更替之基本规律。进入19世纪，1833年耕地面积增加至7.37亿亩，相比于1661年，增长35%；而人口数量，1850年已达4.3亿，比1741年增长200%。单位土地上需要养活的人口已臻空前，传统中国“治世乱世”，由此转换，盛世成本必须偿付。最为悲苦的，则为咸丰一朝（1850—1861年）。

咸丰即位第二年，太平天国成立，随后定都天京（南京）。清朝开国至今，起义连绵不绝，但以此次最为猛烈，动摇朝廷根本。乾隆年间由宫廷能匠精心制作的三口金钟，也熔化成两万七千两金块，以充军费。结果战争仅三年，户部存银只剩29万两，连京城官兵的俸饷都发不出了。由此演变，湘军与淮军崛起，最终扑灭太平天国军队。但是，清朝既经雍正一朝创造出空前的集权制度，而国家最为核心的军队与财政两端，却经太平天国长达十四年的战争，完全改变。兵为国有一变而兵为将有，财政为着应付战争而创造出来的“厘金”制度，也使中央财政失去对地方财政的控制。至此，中央地方两分，外重内轻，弱“中央（朝廷）”成为晚清基本事实。之后，所有变革与变法选择，都在这种弱势中央的基础下展开，困境重重。

太平天国尤为致命之处，是其政治动员，以驱逐异族统治为旗号。清一廷最为隐秘的结构性矛盾——异族统治，由此被广泛揭示，并张目为本。孙中山后来自述，洪秀全的起义即为启蒙他改变中国的关键要素。所以，孙中山所秉旗帜：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咸丰的悲剧没有结束，在他任内，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最终火烧圆明园。临朝仅十余年，面临内外两场战争，咸丰岂不悲苦？

以航海而全球地理大发现为开端的近代化，清朝中国，置身世外，越来越难。乾隆暮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是否叩拜，尚为礼仪之

争；两次鸦片战争，虽然被迫，却无法再独立于这一全球性潮流之外。而且，“中华文明古国被西方彻底打败并羞辱了”（历史学家徐中约评论）。现代化中国的开始，甚为艰难。

咸丰一朝的内外两次战争，明白地揭示了统治中国的爱新觉罗家族所面临的两种结构性挑战：其一，现代化的挑战；其二，异族统治的民族矛盾。而不容忽略的则是，经由平定太平天国一役，制度上空前集权的王朝，却又形成军队与财政两端，中央地方两分格局。所谓晚清舞台，即此。此后，历史演化，即为这两项结构性矛盾的逐渐激荡直至崩裂的过程——比如粤汉与川汉铁路的收回国有，以及皇族内阁的确立。这当然是一种国家危机，晚清岁月，还能出现像康乾一样的强人皇帝吗？稍显可能性的是“同治中兴”，君臣同心，协力图治，颇有新象。可惜“中兴”时间过于短暂，内外挑战甫定，一切重归旧态。

晚清历史，被揭破的民族矛盾，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现代化挑战，就是这一历史舞台，无数英雄需要破解这双重难题。

人 物

1894年，甲午战争。经此一战，清廷内部由“同治中兴”而诞生的自强运动，宣告失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技术性道路选择，因战争失败而不得不转换变革的范式。“救亡”，成为此刻最为准确而又激荡人心的概念。晚清中国，到了是否以及如何进入现代国家的加速期，这同样也是爱新觉罗家族是否可以延续统治的关键时期。双重难题，均待破解。

在晚清双重结构性矛盾的舞台上，我们已经尝试着复原了解决民族矛盾——倾覆清廷的辛亥革命现场。那么，以冲突、人物与舞台三要素论，促成传统中国进入现代国家的那些核心人物呢？若失此端，历史将无可论与叙。

孙 中 山

1894年，广州行医的孙中山，相当长时间竟然闭门歇业。医生这个职业虽然收益丰厚（这也是孙先生早期革命经费的重要来源），但却难伸其志。在歇业时间里，孙中山完成了写给李鸿章的清廷变革之论。但这次精心策划的与李鸿章见面，最终未遂。可以理解的是，李鸿章作为北洋水师的首脑，这时正处在与日本进行海战的关键时刻，变革之论，于他而言，毕竟缓不解急。第二年，1895年，孙中山在广东起事，第一次广州起义，揭示孙中山革命之途。

这是一个明确而直接的线路。若欲破解清朝中国现代化的挑战，必先解决民族矛盾，即以革命推翻满族人的统治。

孙中山所凭力量，这个时期，来自两个方面：会党与华侨。

晚清土地与人口压力，传统农民因失地而被挤压出乡村，涌进城市；中国的秘密社会（会党），因此颇有人员供给——以血缘、地缘以及行业聚合而成的会党，是挣扎在社会底层成本较低的自保之道。这其中，又以战争结束而退伍的军人为主流。在广东，李瀚章为其弟李鸿章招集的大量兵源，1895年，即有四分之三士兵遣散。这些士兵返乡自是不易，流落街头，加入会党，没有意外。这种社会不稳定因素，是孙中山认定的革命的主要力量。

而广东作为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省份，又积累了一批具有现代专业技能，能与“夷人”打交道的中国人。他们觉得自己接受了新式教育，比传统儒家名流更熟知世界大势。但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社会结构里，他们无论多有财富，进入中国等级社会的高阶，没有门路。同时，广东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每年约有12万人前往东南亚和美洲各地充当苦力，由此而形成人数目庞大的华侨。显然，这一新型人群有着改造清朝中国的原始动力。

孙中山的天才之处，在于发现联结会党与华侨的策略所在。即：华侨出钱，会党出力，合作革命以推翻清廷。这当然与我们后来印象里的“革命军队”不同，它更类似于西方公司治理安排。孙中山作为革命家，寻找华侨资金，用以资助并领导会党革命。

这种革命模式，获得成功并不容易。1900年，孙中山再举惠州起义，结果仍然失败。只是这次失败却是一个转折，即以推翻清廷作为传统中国进入现代化的手段与过程，被更多人认识，继而认同。手段之外，孙中山的民族、民权与民生“三民主义”——改造中国的思想，仍需等待时间被认识与认同。

康有为

若将孙中山论为边缘集团由底层开始革命，然后将中国导入现代化轨道；那么，康有为之途正好与此相反，他意欲在中央（朝廷）内部完成变法之举。作为文人集团的代表，康的选择当然更传统，也符合中国学人入仕之后作为的一般模式。

1895年，孙中山广州起事之时，康有为殿试以二甲四十八名取入，由此入仕。之前，康有为重解经典，以求变法之理论武器，所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皆为这一路数。梁启超解释老师康有为的这一选择，以为传统中国变法阻力过巨，非改造经典立一奥援，无可破题，“与二千年之劲敌抗耶”。几乎在不经意里，康有为找到了一条宣扬学说“最现代”的传播路径。参加殿试之前，《马关条约》签订在即，康有为联络各地赴京考员“公车上书”以求阻止。这份上书未能递达光绪案前，却由康有为拿到上海印刷出版，由此奠定他在传统读书人群体里的名声。利用当时最先进的传播手段——书籍以及报刊，康有为的社会动员，显然超越传统官僚。

康有为变法之途，以中央着手，一而再、再而三上书光绪皇帝，

以求闻达。果然，光绪看到了他的上书，康有为宣称若不变法，“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见煤山前事”——这是明朝亡国旧事。康有为如此说法颇为不恭，但却甚得光绪胃口。1898，戊戌年，康有为终获变法的主导权。戊戌变法，也由此而成为清廷内部变革，以求进入现代国家的一次尝试。

戊戌年间的维新运动，仅仅百日，即告失败。

有意思的是，康有为的种种变法举措，即使是废科举，都能得到清廷官僚的同意放行，惟独在是否授权予康有为这一项上，非康有为维新一党，悉数反对，全体对抗。文人的改革路径，以改造经典而立一奥援，看似正途，而正是此端招人忌惮。章炳麟评论康有为：“只闻康欲作教主，未闻欲作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异，惟欲作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此语道破文人游戏的内心。康有为不仅想成为变法的主导者，还想成为“圣人”——政治与思想两端，均欲占据高地。果然成功，即使皇帝，也只是他的思想之臣而已。传统中国人，心思多精细，岂能看不破此中玄机？

将自己的思想立为“圣人”之巅，文人集团的潜在对手，自是众多。而从政治的角度观察，康有为作为具体的政治人物，所需破解的似乎更难。借助上力，以中央变法为经纬，这一康氏路径，其麻烦之处在于，此际实则由两个“中央”——慈禧与光绪维系着脆弱的双权力平衡，如何在这一走钢丝的道路上，保持平衡并实施变法，才最为惊险。结果，康有为先打破传统官僚体制的人际网络的代际传承关系，接着又打破双寡头的权力平衡。戊戌变法失败自无意外，康亡命日本，光绪亦幽囚瀛台。

传统中国欲进入现代国家，无论起自边缘，还是发自中央，皆不顺遂。

袁世凯

袁世凯非传统学而优则仕一途，使他在清廷官场获得声誉的，是他在朝鲜的善断与应变。1884年，朝鲜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将朝鲜国王挟持到景福宫，胁迫国王召请日本公使进宫保卫，并宣布脱离中国“独立”。朝鲜是中国传统藩国，此举不啻是赤裸裸地冒犯。袁世凯一边上书李鸿章请求派兵，一边致书日本公使申明大义。在未获答复后，断然率兵进入朝鲜王宫，解救出朝鲜国王，即使政变流产——史称“三日天下”破产，亦使日本之诡计失败。此举甚得李鸿章赞美，袁遇知遇之人。后来传言李鸿章临终指认袁为其继承人，其彼此关系的源头在此。

这年，袁世凯年仅25岁。

也因为朝鲜“甲申政变”，日本人注意到了这位“有彪悍之手段”的年轻的中國官员，而朝鲜国王也因此聘请袁为朝鲜训练“新军”。袁世凯由此而意外获得“知兵”之名。

两次鸦片战争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改变了中国重塞防而轻疆防的传统模式，北洋水师，现代海军由此兴起。但经甲午一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于是，海军与陆军之摇摆，重回陆军一途。1895年，天津小站练兵开始，“知兵”的袁世凯，终于有机会另创格局，独树一帜。

以现代化方式训练中国军队，显然是发自清廷内部的一项技术性变革，它与传统师夷长技以制夷，理路一致，因而实施起来，相对顺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项变革因其源自清廷，也因为其为技术性变革，而不为人所关注。但是，任何军事的技术性变革，实则为政治性行为。它的深刻性，尤其是力量结构，虽则未必广为人所知察，其对历史的推动性作用，却是长久。比如我们研究中东以及南美诸国的现代化运动，军人集团对政治运作的影响力，颇为重大。只是，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之演进，未必采用这一观察视角。也因此背景，袁世

凯后期之作为，难觅解释框架。

演 进

1895年，解决甲午战争的《马关条约》签订，中国付出2万万两赔款的白银、割让台湾，后来为赎回辽东半岛又付出3000万两白银。割地赔银，丧权辱国，损失空前。同时，这一年改变未来清廷走向的关键人物，边缘集团的孙中山、文人集团的康有为以及军人集团的袁世凯，也悉数登场，开始了他们各自从不同的方向破解如何将传统中国带入现代国家这个难题。

这个故事，或者说这段历史后来被简化成这样一种逻辑叙述：孙中山的“共和”与康有为的“君主立宪”竞争十多年，终以辛亥革命决出输赢，共和制度确立；之后，袁世凯窃权，并且妄图恢复帝制；再后，继承总理遗志的蒋介石领导北伐，终于打败北洋军阀……历史果如这般“拳击赛”？泾渭分明、黑白两端，实则属于历史的戏说与演义，虽则符合传播原则，却非历史本身，亦难以提供理解历史的脉络。

在有着两重结构性矛盾的晚清舞台上，关键人物皆已登场，他们如何将历史演进至革命一途，而最终终止君主专制制度呢？后世读史者能否读史、知史并求得史识，考验在此。

戊戌变法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慈禧将决定是否废弃光绪，最终达成一种“妥协”——立大阿哥，为光绪建储。这是一种“缓刑”，慈禧取渐进之策以解决光绪问题。但是，此举破坏了另一种平衡，即现代化名目之下的，列强对中国的控制与反控制的平衡。大阿哥之父载漪竟然连续三天未得任何列强之贺，由此可见，慈禧中途换马，未必被列强认可。传统中国进入现代化之途，其间耻辱，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朝廷大臣选择，无论慈禧还是光绪，都需小心探测洋人之意。何况立储换君之事，洋人的冷漠，反过来激化了清廷内部死硬派的对抗。比如载漪